

中共與中國之適應與衝突

曹 伯 一*

- | | |
|-------------------|--------------------|
| I. 引言 | IV. 鄧小平「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 |
| II. 中共建黨初期之彈性格 | V. 展望「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 |
| III.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改造構想 | VI. 結論-中國社會變遷趨向 |

I. 引言

每一個政治體系都有一特殊的模式深藏其中，作為政治活動的取向，這一政治文化概念已成為政治理論中重要一環。政治文化是態度，信仰與情感的集合，它賦予政治過程以秩序及意義，並且提供了政治系統中支配行為的假設及規律之基礎，它包含了政治理念與政治的運作規範。一種政治文化是政治體系的共同歷史以及體系中成員生活累積的共同產物。凡此，均根源於共同事務與個別經驗。

人類社會常處在「重組」過程之中，舊的社會組織解體，重新進行組合，這現象與「文化溶合」常併合進行，形成社會轉化。社會轉化時，重組「取向」與社會成員「適應」轉化的能力，都成為關鍵性課題。

中國在滿清末葉，兩千年君主政體一改而成為共和政體，轉化幅度甚大，轉

* 臺灣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副主任。

化為時急促。於是在取向上顯現紛雜，在適應上顯現失調。當前中國問題，本質上與社會「取向」的爭辯，與「適應」的失調，都有密切關聯。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處在強烈東西文化衝擊之中，這種文化衝擊，促使中國人必須另行塑造中國社會，以及新的文化型態，以適應此種新的情勢，具體的社會意向却多半是在求取國家富強層面上着力。

一百四十年來，中國人經過幾個摸索途徑：

像一八六五年開始的洋務運動，以求取船堅利砲為主；

像一八九四年開始的孫中山先生與中會革命運動與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以求取政治改革為主；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求取科學・民主為主；

一九二一年陳獨秀等的共產運動，以模仿蘇聯・建立中國富強社會為主；

一九二六年北伐運動，是與中會領導國民革命運動總結後的再開展，以建立倫理的・民主的・科學的整體社會為主。此種兼容東方・西方文化長處的溶合，也是中國新文化型態的形成，一九四七年中國新憲法，正是此種溶合後新文化產物之一。

當前中國的分裂，與統一方式的爭辯，也就是中國社會的重組取向・文化型態的取捨問題。此種取捨應該由全體中國人共同表示意見，決定的權力在全民，決定的標準在於是否符合中國人幸福需求。以這一觀點來觀察當前中國問題，應該是公允，平實的。

各個社會相互間未必全同，但人類仍有共同愛好與共同需求，中國並不例外。一個社會之內的諸般政治觀念・感情和態度，並不是偶發或雜亂無章，相反地它們乃是彼此交織而成模式，並且彼此之間具有互相加強作用。因此，凡一政治文化必自成體系，至少包括了政治行為發生的背景・政治活動的取向；包括了政治體系最高遠的理想，以及普通一般行為規範。如果忽略了這些普遍性規律，無可避免將會引來無比困擾的社會失調。

中共建黨六十五年，建立政權三十七年，其間興衰交替，各個不同時期情況各異，大致起伏如下：

第一階段：初建黨時，強調共產主義特殊性格。

第二階段：依附國民黨內，隱藏了共產主義，發展甚快。

第三階段：脫離中國國民黨，以江西地區為主，推行「蘇維埃運動」，結果失敗。

第四階段：對日戰爭時期，接受政府收編，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獲得極大發展。

第五階段：毛澤東主政，從事中國社會改造工作，以文化大革命為其高潮，中國人與共產黨皆遭受損失。

第六階段：鄧小平主政，調整政策，希望在集體主義基礎上採取局部自由經濟經驗，解決三十年來所造成種種困擾。

綜觀整個過程，以中共與中國之間的適應與衝突作為主要因素，將可以觀察過去・瞭解現在・推測將來。

II. 中共建黨初期的彈性格

中共於一九二一年建黨之初，在表面上與實質上都充分顯露出對於共產主義的忠實執行，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對於其他政黨採獨立・攻擊和排斥的態度，表示「堅守無產階級立場」，並且「不准和其他黨派・團體建立任何關係」。¹⁾

一. 中共早期「寄生」政策

一年後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七，十六)，黨員一百二十三人，在第三國際指導下，討論加入中國國民黨方式，這種方式可以利用國民黨名義活動，易於吸收群眾，易於發展共產黨力量。

基於同樣理由，莫斯科派代表越飛(Adolph A. Joffe)，與孫中山先生商討中國與俄國「聯合」問題時，特別表示友好態度，且在共同宣言中特地說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

1) 中國共產黨黨綱，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九二一年一月。

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²⁾ 目的在使孫先生減低對共產主義之戒拒，有利於蘇聯與中共假借國民黨之力，以求取發展。

中共此種態度，至一九二三年六月的第三次大會，表露更為明確，第三次大會宣言中出現了「中國國民革命萬歲」字樣，代替了第二次大會宣言中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當時有國民黨員懷疑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動機與目的，中共領導人李大釗提出懇切聲明稱：「我等之加入本黨(指國民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³⁾ 這一階段中共獲得快速發展。

二. 蘇維埃運動

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積極活動，製造國民黨內部分裂，奪取國民黨的領導權，迫使國民黨進行「清黨」，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將共產黨員排出國民黨。至此，共黨乃不得不結束寄生政策，再度採取獨立路線。此時共產黨員已發展到五萬八千人，四年之間發展了將近五百倍。

中共再度採取獨立路線，活動於江西省等地區，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以武裝鬭爭與土地鬭爭相結合，進行建立「蘇維埃運動」，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省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其高潮。此期間中共積極推行馬克思主義，沒收土地，鬭爭地主，以武力反抗政府。當時曾擁有武力量二十餘萬人，佔地三十餘縣。至一九三四年失敗，不得不輟離江西地區，逃至中國北方陝西。

「蘇維埃運動」失敗，使共黨重新思考作法，究竟是積極推行共產主義？抑或隱藏共產主義原則先適應現實社會？中共需要在「理」與「術」之間，有所取捨。

三. 抗日民族統一戰綫

中共到達中國北方陝西省時，情形至為狼狽，兵力不滿一萬人，所控制地區僅只少數幾縣。中國政府軍全力進剿，中共內部「兩個中央」正在互鬭。江西時

2) 孫中山與蘇聯特命全權大使越飛聯合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3) 李大釗，對共產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廣州。

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蘇維埃運動」失敗的教訓，對中共是一次嚴厲打擊，也使中共領導者慎重思考共黨理論與社會實際需求的差異，這導引中共偏向實際，以期能繼續存在。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致電中國國民黨，表示支持中央政府，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抗日。一九三七年接受政府收編為「第八路軍」轄三個師，另有「新四軍」在江南地區。⁴⁾

中共接受蔣委員長領導「抗日」，目的是轉移中國政府力量對付日本，以減輕中共所感受之軍事壓力。而且這時蘇聯也處在西方德國與東方日本的兩邊威脅中。發動中日戰爭可以消除日俄戰爭危機；也可以用日本力量牽制中國政府，對蘇聯對中共均有極大利益。

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中國八年戰爭時期，中共隱藏了共產主義，以民族主義面貌，獲得快速發展。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報告說，中共已擁有正規軍九十萬人，民兵二百萬人，建立了十九個大規模的地方政府。⁵⁾

Ⅲ.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改造構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在共產主義意識基礎上建立特定社會秩序。當時以「共同綱領」為基本法，確定「人民民主專政」為體制特性。⁶⁾

共產政權控制了中國大陸，共產制度與中國傳統，其間原本存有極大距離，今後中國文化傳統與共黨政權治行為之間究將產生何種關係上的變化？成為被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九年以後在中國大陸的實驗取向落在三個重點：第一是政治上建立「階級專政制度」；第二在經濟上建立「集體所有制」；第三在文化上全力排斥中國原有傳統，移植來自歐洲社會以馬列主義為基礎的文化型態。

4) 朱德與彭德懷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任命為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發表「就職通電」。

5)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九三〇。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

毛澤東的得意與自滿，使得推展共產主義的積極性極為高漲。但是，這種主導方向，與中國人從歷史經驗中所體會到的需要方向，彼此正好背道而馳：「集體所有制」使人民原有的「目的性」，下降為「工具性」；「階級專政」使全民民權制度的企求成為泡影；文化的「移植」，不僅使中國固有傳統飽受摧殘，且使中國人生活在文化的虛脫之中。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政權領導層，對於中國社會的改造企圖是全面的。改造的手段，完全採取了俄國共產黨經驗，忽視中國人的意願與意見，以武力為基礎，支持強烈的政治控制與傳播控制，中共改造中國社會過程，由五大運動·三大改造·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由摧毀原來社會秩序開始，到以公社為基礎的新的秩序體系，最後再進行文化的改造。中共改造中國社會的目的，在於完成整個社會重組，建立以共產黨為核心的社會體系，包括意識層次·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及經濟運作在內的整個共產黨統制體系。

中共的改造構思，是基於馬克斯理論與蘇聯經驗。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及剩餘價值學說，以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度是產生剝削·產生階級的根源，認為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階層，生產的社會性與生產成果的私有性成為社會的嚴重矛盾，於是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便成為世界各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的共同目標。

中國工業落後，產業工人數量甚少，並不具備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因之中共先採取「人民民主專政」，以四大階級統一戰綫方式，摧毀舊有社會秩序，以此為介於「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一個階段，毛澤東稱此為「新民主主義革命」。⁷⁾

一、舊有社會秩序的破壞—五大運動

一九四九年上期，中共經過二十八年政治的與武裝的奪權活動以後，佔領了中國大陸，着手建立中央政權組織。六月三十日，毛澤東以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名義，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⁸⁾說明這一政權組織是由工人·

7)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〇年一月，全註5)書，頁六二三。

8)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六月，同註5)書，頁一三五七。

農民・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等四個階級聯合專政，十月一日正式建立政權組織，當然這是一個過渡性組織型態。

這一過渡性政權，着手排除舊有社會秩序，其作為方式是進行了五個主要運動：土地改革運動（對農村）・鎮壓反革命運動（對軍公教幹部）・三反五反運動（對工商界）・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分子）・抗美援朝運動（對舊有非共武裝）。

「土地改革運動」於一九五四年六月卅日開始，進行對地主富農的鬭爭，中國約四千多萬地主富農，估計12%被殺害，12%被判勞動改造，25%交農民管制勞動，農村菁英全被摧毀。

「鎮壓反革命運動」，於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開始，主要對象是整肅原有的軍事・行政人員及國民黨黨員。

「三反・五反運動」於一九五一年秋天，自東北地區開始，對私營工商業者進行嚴格審查，予以大量罰款・判刑處分。

「思想改造運動」，自一九五一年初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為開始，強迫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蘇聯經驗，並反覆進行政治性自我批判，嚴厲自責。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共以志願軍名義入韓參戰，立即發動「抗美援朝運動」，除取得民間大量捐獻與青年參軍外，並將為數達百萬非共黨原有之軍隊，消耗於韓戰中。

中共政權初建時，猛烈進行社會破壞工作，部份中國人對共黨統治表示容忍，並非由於對共產主義的熱烈傾心，中國人傳統對於政治的冷漠，同樣顯示在此一時期。

一般中國人對於「政治」冷漠，但對於「國家」是關切的，因之中共大力鼓吹馬克思主義「無祖國論」・「國家萎亡論」，並不易引起中國人共鳴，反而出現對中共政權「認同危機」，但當時中共的政治權威，壓制了此種危機不易滋長。

中共發動五個運動，目的是將原有社會的主要領導分子予以摧毀，廢棄原有社會領導系統。中共破除原有社會秩序，使中共政權前三十年有較安定局面，青年民主運動領導者魏京生等，是三十年後所成長的第二代社會領導分子。⁹⁾

9) 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他以為如果沒有政治現代化，則

中共以五大運動，為下一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鋪平道路。

二、「社會主義改造」的推展—三方面改造運動

中共在「五大運動」展開以後，繼之進行「社會主義大改造」。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綫」目的是進行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¹⁰⁾ 一九五四年九月正式將三種改造列入中共第一次憲法。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開始第一階段先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集體勞動，土地私有。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再進行第二階段「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統一經營，土地私有。然後再轉變為第三階段「高級農業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的特色為土地、農具等生產資料屬合作社公有，按勞分配，逐漸進入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

對於「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自一九五二年開始以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手工業供銷小組」，個體生產，原料及行銷集中處理。第二階段「手工業供銷合作社」集中生產、運銷。第三階段「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生產資料歸合作社所有，按勞力分配。到一九五六年底，已有92%手工業者，納入合作社組織。¹¹⁾

中共建立政權之初，將「民族資產階級」作為聯合專政階級之一，亦即以「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籠絡工商界，並未立即將私營工商業予以沒收，避免經濟上引起混亂，但這些只是暫時性權宜之計。在中共政權稍形穩定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繼「三反·五反運動」後開展。

「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工商業改造的第一階段，工商業仍屬私營，但通過各種合同與社會主義公營經濟建立聯繫，參加統銷、包銷、代銷等方式。

「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此時期已進入「公私合營」，工商業已完全

「四個現代化」將不可能成功，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

10)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11) 中共國家統計局，偉大的十年，北平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頁三〇。五參次薛著稿等，中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頁一五三。

在共黨控制下，原有投資人已失却支配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至一九六六年底，百分之九十九工商業「改造」完成。¹²⁾

三大改造運動推行後，自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結構產生極大變化。私營經濟比重從78%下降為28%，公營·合作社·公私合營等經濟型態，提昇至97.2%。生產資料私有制接近消滅，幾乎已全部納入計劃經濟體系，中國大陸社會起了極大變化。¹³⁾

三、「社會主義建設」—三面「紅旗」

社會政治現象，常與意識型態不能分離，在共產社會中，此種關聯性尤為明顯，形成特有本質。故中共的政治可以歸屬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政治」，中共的政治表現主要依據一套嚴峻的意識型態作為政治運作的基礎，共產主義意識的支配作用，使中共產生了以下幾項重要政治觀點：

1. 資本主義必然崩潰，作為一種政治社會與經濟組織的社會主義，必取而代之。
2. 瓦解資本主義的社會過程，必須經由有紀律的組織，行動與階級鬥爭，而作有目的推展。
3. 共黨統治的社會，必須經由急速的社會化及工業化，以激發內部的社會變遷。
4. 由於內部的反抗和外來的威脅，共黨必須緊抓政權，經由中央集權的控制和領導，求取意識型態的共同協議，行動上的基本相似性，藉以保持內部團結。

以這種政治觀點為基礎，在三項「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完成以後的下一個步驟，毛澤東繼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一九五八年是中共政權重要關鍵性的一年，毛澤東被以後鄧小平等評為「開國有功·建國有過」，亦即是以一九五八年為區分，¹⁴⁾ 這一年從「過渡時期總路

12) 薛暮橋等前揭書，一五四頁。

13) 全前註。

線」轉變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進一步推展三個「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第一「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第二「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和、第三「人民公社」，以後這三個目標被稱為「三面紅旗」。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中共第八屆大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確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這個「總綱領」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綱領。¹⁵⁾

綱領要求：1.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問題；2.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3. 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4. 工業和農業並舉；5. 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並舉。

一九六〇年中國大陸發生飢荒，一九六二年三月以後總路線的聲音逐漸低落。

一九五八年春，中共發動「農業生產大躍進」，「地方工業大躍進」，要求加速提升生產量，中共「大躍進」的具體方法：「深翻土地」「高度密植」，並開展「全民大鍊鋼」，「全民大挖煤」。要求「一天等於廿年」要在十五年內超過英國趕上美國。¹⁶⁾

農業「高級合作社」出現後，土地所有權歸合作社所有，而且集體運作，基本上已經完成農業集體化工作。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提出將小型合作社併為「大型合作社」構想，這種「併大社運動」，也就是「人民公社」的準備。一九五八年四月開始試辦「人民公社」，將工·農·商·學·兵合組一個大公社，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以後將公社作為鄉級行政單位。公社內生產資料歸社有·集體勞動·生活資料採配給制。¹⁷⁾ 公社制度所造成的極大變化，那就是「人附屬於土地」。

中共以「三面紅旗」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指標，建立集體化社會，「三面紅旗」

14)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15) 「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中共第八屆第二次全會通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16) 一九五八年夏收之後，「人民日報」開闢「豐產榜」專欄，報導各地「豐產田」產量，誇大程度逐漸提高，九月十八日報導廣西環江紅旗人民公社，每畝生產稻米十三萬公斤。

17) 最早試辦是河南省信陽專區遂平，將嵯峨地區四鄉合併，名為「衛星人民公社」。

集體化方式，使農民生產意願急劇下降，以政治目的為主的構想，完全違背了經濟法則，使經濟行為中應有的經濟秩序，完全混亂，而且在文化上與中國傳統相背，在人類追求幸福共同意願上則與中國人民願望相衝突，「三面紅旗」建設方針實施一年八個月，中共政權經濟情況與政治權威均產生嚴重損害，人民飽受痛苦之餘，群起而消極抵制，造成連續三年大饑荒。

四. 文化的替代—文化大革命

三十多年中共政治體系，深受中共領導分子個人心態影響，毛澤東·鄧小平類皆如此。

中共政治領導，同時也表現出對於意識型態的執着，對權威爭取的非制度化。

一九五八年，推行「三面紅旗」失敗，毛澤東被迫讓出國家主席，但仍任黨的主席。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面對長達三年大飢荒，在政策上不得不讓步，局部採取了自由經濟方式，提高農民生產意願，鄧小平協助劉少奇推展新政策，允許農民保留少許自留地，產品可以在自由市場出售。

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一月，以黨主席身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些問題，一個突出的可注意的主題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¹⁸⁾這時已顯露出以意識鬥爭為外表的權力鬥爭，已經在逐漸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指劉少奇與鄧小平等。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想在中國大陸建立一個新的文化，還是僅僅是毛澤東為排除異己而發動的運動？「文革」以文化為標榜，與中國傳統文化間的關係如何？

在文化意義上，毛澤東倡導「破四舊·立四新」，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目的是要排斥中國傳統文化，移入以馬列思想為基礎的新的文化型態。

18)「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共二十三條，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通過。此會議由毛澤東主持，為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主要文件。

「文化大革命」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開始，前後十年，這一個以內部權力鬥爭為主體兼有排斥中國文化涵義的政治運動，對於中國人造成空前創傷，對於中共政權也造成極大傷害，過去中共曾稱之為「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後來改稱為「十年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六），中國共產黨到處千篇一律地鼓吹「毛澤東思想」，而毫不考慮中國人是否尚可有自己個人的思想，更不考慮中國是否尚應有傳統中國的思想。毛澤東提出「破四舊·立四新」，在文化意義上，將是中國傳統文化予以根除。現在文革是失敗了，在文化意義上，那是十億中國人堅持了中國傳統，拒斥了中共移植外來馬列文化的企圖。假如把毛澤東看作「革命家」，人類歷史上沒有那一個國家的「革命家」，會如此仇視自國文化，一致於此，以「毛澤東思想」為基礎的文革，實質上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為敵，與十億人所習慣的文化內涵為敵。

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發展歷史悠久，早在中共出生以前兩千年，中國的哲學·科學和文學，即已具有極高水準，中國文化內涵中普遍深受孔子儒家倫理哲學的影響，中國文化是唯一能從遠古到現在還能繼續存在·發展的文化體系，當然具有滿足人類需求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不可能也不應該進行此種切割。

一九七五年的中共第二憲法，是一部形式上極為怪異，內涵上則代表了自一九四五（延安）毛澤東掌權以來，整個中共的極端控制思想的總表露，也文革的最高目的的顯示。¹⁹⁾

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說明十億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執着，並對共產主義者的移植馬列文化，表示出強烈拒斥。鄧小平政權不得不從事經濟調整，以提升生產力為其重點。因為三十五年的集體制度，已將中國人的勤勞美德·生產意願等摧毀無遺。中國人悠久的自由生活方式·寬宏精神·和諧社會·倫理秩序，皆受到摧殘。

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通過，全文僅三十條。第二十六條「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為「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顯示出這一憲法的特殊性。

IV. 鄧小平「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

鄧小平於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在中共黨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為鄧小平政權的主要標誌。鄧小平提到這概念時，並說明這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其方式則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²⁰⁾到現在為止，究竟何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尚未具體。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也祇是散篇文章，而不是有體系的理論。²¹⁾

一、「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主要內涵

中共「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小心謹慎地集納鄧小平的論點，鉤劃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中共人員中對這一籠統概念較為完備的一次說明，以下諸項是蘇紹智「目前」所認定的主要內涵：

第一：生產資料公有，實行多種經營形式。

第二：所有權同經營權適當分開，經營者成為一個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第三：突破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概念，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第四：維持階級專政，建設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此為高度民主。

第五：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據此以追求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二個文明一起抓，此為高度文明。²²⁾

二、三個層次

在表面上倡導唯物主義的共黨社會中，卻處處顯示出唯心主義的支配功能。「中國式社會主義」的中心環結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此結合「物質文明」，

20) 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2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一月，繁體字本。

合而成爲「二個文明一起孤」；然後將這「高度社會主義文明」與「高度社會主義民主」，構成鄧小平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這一結構約如下述三個層次：

1. 中心：「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包括「五講」·「四美」·「三熱愛」。
2. 第一環結：「高度社會主義文明」，含二重點，即以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指導求取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包括「公有制」·「對內搞活經濟」·「提高生產力」·「商品經濟」·「價格功能」·「責任制」及「對外有限度開放」。
3. 第二環結：「高度社會主義文明」與「高度社會主義民主」相結合。包括前述第一環結中，物質文明的精神文明結合的「高度文明」。至於所謂「高度社會主義民主」即指階級性的·以共產黨爲「先鋒隊」的「階級專政」。

三.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主導地位

具有中心地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包含三個部份，即「五講」·「四美」·「三熱愛」，其中共十二個條目：

「五講」指：「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

「四美」指：「心靈美·語言美·行爲美·環境美」。

「三熱愛」指：「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

以上十二個條目，分開來看，可能被認爲已較趨向理性。如果結合在一起觀察，共產主義集體意識也就清楚了。「三熱愛」中，缺少了中國文化中所必需的一個「熱愛」，即「愛家庭」。中共不願倡導「愛家庭」。「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這對於非共的中國人，將形成嚴重政治迫害，與精神虐待。「三熱愛」與中國文化與人類思潮，都存在着明顯衝突，甚且背道而馳。

「四美」之中缺少了人類所共同必需的「生活美」，如果人類竟然失卻了「生活美」，其他種種可能都祇是局部的枝節問題，爲政的目的也將茫然。

22) 蘇紹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面面觀」，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五年七月三日第二版。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倡導的「三項十二目」，從整體來看並非以中國人利益為基礎，只是在局部問題上作倡導謀求中共控制的便利，但「中國式社會主義」却是以此為核心。

四. 社會主義物質文明

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這就是鄧小平的經濟政策。

一九七九年，中共宣佈轉入「經濟調整」，提出一調整·改革·整頓，八字方針。然後在一九八二年再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希望經由「對內經濟搞活」與「對外開放」途徑，實行「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目標是在公元二千年把農工原生產總值提高四倍，使國民所得由目前二百餘美元提高到一千美元。

六年多來的經濟政策，中國大陸產生了某種程度變化。

在農村方面，從過去完全集體經濟，轉變為「集體所有個體耕作」，「包產到戶」制度以報酬為動力鼓勵農民提高生產意願，農民要獲得「超額」部份的收入，就先完成原先約定的「定額」產量。

城市方面，中共正在下放企業的自主權，並把中小型工商業包給私人經營。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採取市場體制·價格功能。²³⁾

在對外開放方面，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再增加開放十四個沿海港口，並準備將長江口三角洲·漳江口三角洲及珠江口三角洲等地區，給予特殊發展條件。²⁴⁾

五. 一九八五年政策取向

1. 「四件大事」與「一個中心」

一九八五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題作「和衷共濟搞四化」，這一標題代表了主

23)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議」，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

24) 中共於一九八四年四月決定開放沿海十四港口，一九八五年七月改變先開放四個港口，對於中共開放政策顯示出意圖，對於中共內部歧見，也顯示出意義。

層次概念，可以看出主要是求「四化」·求「團結」，次層次概念，也是具體重點：是「四件大事」·「一個中心」，「四件大事」如下：

1. 推進以城市作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
2. 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
3. 繼續搞好整黨；
4. 進一步調整領導班子。

社論說明這四件大事圍繞着一個中心：「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目標則是本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社論也呼籲：這是一個「艱苦過程」，要「和衷共濟」，「凡是不和諧不協調的地方」，要團結起來。

「四件大事」，分屬經濟·政治兩部門，本質上也就是鄧小平「經右政左」路線的延續。四件大事中之前兩事是「搞四化」，屬經濟性，求「變」；後兩事是「和衷共濟」，是政治性，求「不變」。這裏出現了目標要求希望塑造一個新的社會型態，包含經濟的「求變」與政治的「堅持」；但在另一方面「變」與「不變」也導致社會的矛盾與失調，成為面臨的困擾。

2. 整黨與政治權威

中共在「十二大」宣佈「整頓黨風」為黨內四項工作重點之一，一九八五年，中共將「繼續搞好整黨」列入四件大事之中。中共欲透過整黨，以重建其政治權威。

儘管中共致力於經濟開放，但中國大陸人民並沒有變得更自由，中共統治者也無意讓他們更自由。一九八四年十月城市經濟改革方案中，「加強黨的領導」仍然屬於重要事項。²⁵⁾ 胡耀邦發表談話，仍要嚴格控制新聞自由。²⁶⁾

衆所周知的中共「政治掛帥」理論，形成了極度「泛政治」環境，此種「泛政治」型態，一方面固然使中共權力突出，控制了一切；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必須擔負起政治成敗的全部責任。三十餘年建設進展滯緩，「三信危機」出現，這是人民自然地將政治責任歸之於中共政權。此種自然發展的結果，是中共政治權威的

25) 見註 23)。

26)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四日，第一版。

衰退。一九八五年中共將「繼續搞好整黨」列入四件大事之中，中共想透過整黨重建政治權威。

3. 調整領導層的意義

政治領導層的產生與政治型態及制度運作，彼此間原本存在着互動的運作功能。在共黨政治體系中，此種傾向尤為突出。三十年來中共政權領導層並無太大變化，雖然內部權力鬥爭不絕，但大體上都有其共同性。此種共同性與馬克思理論有密切關聯。

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各黨派協調會上提出「第三梯隊」的說法，當一九八二年三・五月間的黨政機構改革及九月「十二大」的中央權力機構改選，已有具體體現。一九八四年七月胡啓立等調整職務，「第三梯隊」建設工作轉趨積極。

中共中央組織部於今年二月十日透露，中共中央已經決定，在今年九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召開之前，黨中央、「國家機關」部委及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領導班子全部調整，年底前把企業，特別是骨幹企業的領導班子調整。這一項人事調整幅度甚大，時間甚緊迫。

中共有許多嚴重問題有待克服，必須藉加速人事更替作為解決之道。最重要的問題有二方面：

第一：領導階層老化問題，目前中共領導階層年齡結構，最高領導核心六人政治局常委會，平均年齡七六・八三歲。

第二：黨內反對力量強化，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主流的改革派，正遭遇黨內教條主義者強烈反對。

基於這些因素，中共當權派着力於加速人事更替，以期減輕老化和反對者的壓力。

人事更替工作，並非毫無阻力，最顯著的是老幹部不欲交權。年今「瞭望週刊」第八期專文，顯為「三代默契，四化可期」，提出三個梯隊的任務：第一梯隊一長壽清靜；第二梯隊一扶持後進；第三梯隊一拚搏上陣。²⁷⁾

27)「三代默契，四化可期」，瞭望一九八五年第八期，二月二十五日，北平。

這段話已經十分露骨，一方面要求交權，一方面則不欲交權。

4. 矛盾與團結

「紅旗」(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刊出一篇長文，顯示出中共政權面臨的一些基本困難，包含「理論與實際」之間·「破與立」之間·「局部和整體」之間·「領導和被領導」之間，都存在着矛盾。這些矛盾代表了當前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困擾。「紅旗」歸結了這些矛盾所形成困擾，名之為「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²⁸⁾

中共內部的歧見，顯然是「紅旗」發表本文的主要動機。文章內一段話已指出鄧政權的政策正受到內部嚴厲反對：

「如果讀了『哥達綱領批判』，就說現在中央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不是這麼說的，那就大錯特錯了」。

中共內部強烈地反對鄧派現行政策，以「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層次進行反對。薄一波在六月廿八日談話即仍然明白表示了此一意向。²⁹⁾

路線之爭與權力之爭，在中共歷史中常糾合在一起，現在是否會再次形成中共內部的嚴重分裂？「紅旗」專文中作了強烈暗示。「紅旗」以為從今天的「實際」出發，必須否定毛澤東「破字當頭」這種提法和做法；否則，將會導致：「第一：可能重新動亂，第二：會嚴重地影響四化建設，第三：還會在全世界損害我們的形象」。用字已甚明確，涵蓋面也甚廣闊。³⁰⁾

鄧小平去年十月廿二日對「顧問委員會」講話，在「講話」中透露出鄧小平目前顧慮到的幾個問題，這些問題正與現在政策取向有密切關聯：

第一：現行政策「連續性」問題，鄧小平體會到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中共內部對於經濟調整意見分歧，已日益明朗化。

第三：幹部老化問題，鄧以為這問題「疙瘩」比較多。³¹⁾

28) 紅旗雜誌編輯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紅旗一九八五年第三期，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日，頁一，北平。

29) 薄一波，「從五方面鞏固發展整黨成果促進改革」，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30) 同註 29)。

31) 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第一版。

方今鄧小平政權主要困難，是由於只希望取得經濟效果，而並不欲同時在政治體制上作合理調整。由於不能從根本上進行全面改革，於是社會變遷失却整體特性，於是社會互動產生困難。今年度的趨向與鄧小平的憂慮，仍然隱含了此種實質。

在現實意義上，鄧小平政權不得不調整政策，追求生產力的提升。三十多年實際體驗，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已經萎縮了人民生產意願，在經濟政策轉變過程中，必然會引起意識型態的衝擊。陳雲在六月廿九日表示：「我們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是搞其他現代化。」已經流露出中共高層幹部對於意識衝突的憂慮。³²⁾

經濟政策上正在「吸收外來」經驗，在意識型態上却要「抗拒外來」理念，體現出一個矛盾的政策路線。當前中共政策的目的層次已經明顯，目的是希望「左右逢源」，經濟上借重資本主義旺盛生產能力，政治上建立有利共黨獨占優勢，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無非即此之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出「理論與實際」評論員文章所引起的風波，其本質也就是政策與意識的矛盾。³³⁾

V. 展望「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

由於馬克思主義者，對歷史的解釋及未來發展的預測，與實際並非契合，於是共產主義的價值與實用功能自然受到懷疑，因之中共政權所賴以存在的權威基礎，隨之受到影響。同時，中共長時期來政策的反覆，對領導層的種種批判・翻案，以及不完整的法律制度不斷遭受政治特權的破壞，使中共政權產生了嚴重合法性的危機。

任何一個政治體系，要維持基礎穩定與持續發展，必須有賴政治體系中成員支持。如果他們都能信任政治結構的決策・過程・目的及執行方式，都具有公

32) 陳雲，「在全國端正黨風會議講話」，人民日報，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第一版。

33) 人民日報評論員，「理論與實際」，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第一版，並參見註 29)。

正性與合理性，具有道德上「善」的品質，則他們將會認可所制度、法規的約束，他們也會順從導向，如此可視之為政治體系擁有合法性基礎。

鄧小平何以必須從事改革？這是「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來的教訓。鄧小平構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在三十年實驗無功以後，是在長期不成功的基礎上的大轉變，促使鄧小平政策必須改變，至少有四個重大壓力：第一，中國人要求改善生活的呼聲；第二，對外接觸增加以後，社會對比所衍生的自卑；第三，中華民國在臺灣基地建設成就所形成的強烈對照；第四，文革後中共政治權威的急劇下降。對於這些壓力，鄧小平具有深切體認。

一種主義，一種制度，都會有時間與空間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中共以往雖有奪取政權的經驗，但卻沒有治理政事的經驗。毛澤東採取了列寧·史大林俄國經驗作為制度基礎，也採取馬克思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欲將二者應用於中國。毛澤東三十年實證，其結果是失敗的，正如在江西時期「蘇維埃運動」的結果相同。

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也堅持公有制，但所謂「改革」，則是採取自由經濟方法，用以解決三十年實驗共產主義所造成的種種病態。鄧小平意欲循此提升中共政治權威，循此解除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

鄧小平·胡耀邦調整政策，希望在共產制度內引發生機與效率，但其內涵特質應予瞭解：第一，「所有權」的問題，根本上仍維持公有制；第二，黨的最高統治權絕不放棄；第三，多元化的價值觀並未出現；第四，全面性個人意見自由和政治自由，斷不會出現。鄧小平政策調整仍然存在意識型態的堅持。如將鄧·胡政權的政策調整解釋為中共將背離馬克思主義，這種解釋如不是共黨極左派對鄧小平的理論層次的攻擊，否則就是自由世界天真的幻覺。

對於中共黨內知識分子的內在精神、心理和政治發展，並非易於預料。中國大陸在共黨控制下，人們普遍地長時間在政治壓力下被迫說謊，今天的共黨幹部豈能肯定都是在說真話？因此，對未來的政策延續性，普遍具有懷疑。雖然鄧小平等已掌握了黨的政治局，及其他重要職位，但一九八二年十月間所推動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竟然在短時間內快速發展，使改革派極為震驚。主要

是成千上萬被削去權力的左派幹部都在伺機報復，被改革政策損害了權益的幹部也在趁機推波助瀾，迫使當權的改革派不得不快速地停止了這個運動，耽心一發不可收拾。

「改革」是一個錯綜複雜巨大無比的工程，一九四八年西德從強制經濟改為市場經濟，當時西德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界人士・手工師傅・農民・工人・消費者・新聞從業人員及政治家，是曾經經歷過市場經濟，且瞭解和何運作，助成了這一大改革。但在共黨控制下的中國大陸，要進行「市場經濟」改革，這種人才就甚為缺乏，所蒐集的世界性經驗與創造的成就，也同樣難周，而且更麻煩的是中共黨內還存在著馬克思陰影意識的抗拒。

「改革」無可避免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諸如：收入差距加大，官僚體系必須由統制式的主觀性計劃改變為審度情勢的計劃，尤其是要注意經濟的「魔術四角」的變化情況：物質穩定・高就業率・成長率和外資的均衡，這四個主要因素的變化，將影響或測出經濟改革的成就或困難的程度，即使在共黨嚴格控制下的社會，也難有例外。

在主觀「意識」所控制的社會中，中共強力堅持「四個原則」的社會中，我們必須把「意識」因素計入，纔能對這個社會有深入的理解。中共要求取「改革」的持續進展，鄧小平要建設「中國式社會主義」，將來的使變，關聯在下述幾個關鍵性課題：

第一：如果走向「市場經濟」，則較為分權和較大個人主動成份的社會體制，仍是必須的配合，中共堅持「社會主義路線」原則是否能夠容忍？這種分權與個人的制度？

第二：要在共產社會基礎上引發生機與效率，多元的價值準則，那仍然是必要的條件，也將必然會出現，中共「堅持專政原則」是否對此能夠容忍？

第三：要求健全法律強化法治的呼聲，已經出現，這與黨的突出地位必然抵觸，中共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原則，對此能否容忍？

第四：中共改革路線能否穩定延續，為國際間觀察家・中國大陸中國人乃至共黨幹部所普遍疑慮，其根源乃在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原則，根深蒂固支

配了中共，而與改革(即使極為有限)產生矛盾，此種矛盾有無消除可能？以何種方式消除？

第五：中共能否接受一種久為中國人所認知・認同的精神內涵，即中共能否不再否定或鬭爭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傳統？進而能予接納？從而避免中國文化與共產主義之間的矛盾？

VI. 結論—中國社會的變遷趨向

任何社會都是在不斷變遷之中，變遷的延續，構成了歷史的發展；變遷的開拓，導引了未來的奮鬥。

從一八四〇年以來，迄今一百四十餘年，中國人的重要目標，是要尋求中國現代化的途徑。在西方文化強烈衝擊之下，中國人必須在傳統文化基礎上重塑中國自有的新的文化型態。無論自強・洋務；無論革命・變法；乃至五四・北伐，都可涵蓋在此一意境之中。今後，中國往何處去，其實仍然是此一課題的延續，是要尋求中國現代化的道路，是要重塑中國文化的新型態。

一. 持續性與變動性

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同時會考慮到發展的持續性與變動性。持續性着重傳統文化秩序的延續，珍惜可貴經驗的累積，並維護發展過程中社會・政治的安定；變動性則着重於文化的融合與創新，適應變遷社會新的需求，將持續性與變動性相結合，社會既可穩健踏實；又不致排斥迎頭趕上的創新機會。這既是崇高的和諧哲理，也是社會進步的能力來源。承認差別，渾然合一，我們所建設的社會正是如此。

中國往何處去？基本概念應是：在全民基礎上形成國家功能，在國家功能基礎上增益全民福祉。

誠如哲學家約翰・彌勒(John Stuart 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所指出：「從長遠看，國家的價值是建立在組成國家各個分子的價值上。」社會各分子與整體原

本相互依存，在健康分子的基礎上，整體自然堅強；在堅強整體維護下，分子益趨健康，相互依存，融而為一，此乃中國哲學的中道，也是過去七十餘年中華民國建設社會的原則，共產政權所設計的制度，却表露出過度追求共產一己目標的趨向，這種追求共產利益的趨向，無可避免地與傳統文化產生衝突，與個體目標之間產生差距，中共「四個原則的堅持」，說明了此種趨向，也說明了中共與中國文化及中國人之間所存在的差距，無遠見的狹隘，形成共黨政權與人民的對立，實際上也為共黨政權帶來無比困擾，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有意排斥中國文化，毛澤東與鄧小平也都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無比壓力。

二．中國現代化社會的內涵

中國人需要什麼？歷史已提供了明確答案，鴉片戰爭以還，在中西文化激盪下，百餘年來中國人尋求自處之道，其間至少經歷過幾個主要階段：洋務運動追求船堅砲利——以「科學」為重心階段；甲午以後與中會與維新運動追求政治改革——以「民主」為重心階段；「五四」結合科學與民主——形成綜合目標階段；北伐運動開展「民有·民治·民享」更完整的導向，追求倫理·民主與科學，增益並開拓了社會目標意境。

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不單純是「科學」或「民主」，「或祇是科學與民主的結合；中國人所需要的那是文化融和後的創新型態，兼容科學·民主與倫理文化，是東西文化並育的嶄新文化型態，鄧小平的「四化」除在局部性經濟範圍之內，拒絕了政治現代化的建議（民主），排斥了中國傳統文化（倫理），因之，「四化」充其量僅與一百年前的「洋務運動」差堪比擬，這種非整能的改革，當然不能滿足中國人現代化的需求。

人類普遍存有追求生存與生活的本能，人類又普遍同具追求更幸福社會的願望，此種主觀性願望之滿足，必須透過客觀性社會制度，方能期其實現，中國大陸共黨嚴酷控制，移植外來馬列主義，要將中國人塑造成另一型態，實際上並未奏功，觀乎鄧小平之必須倡「中國式社會主義」之說，無異說明三十餘年「俄國式社會主義」的強力推展顯未成功，為中國人所拒斥，迫使鄧小平不得不另

關蹊徑。但鄧小平仍是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基礎上構思一切，「三極愛」為共中心，因此，「中國式社會主義」仍然無償解決中國文化的衝突。

三. 合理社會的基礎

求取中國合理社會之道，其理易明，亦即能使十億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中，一個能為中國人提供充分貢獻的社會制度，能提升生活內涵，也能美化生存環境。這一制度至少必須含有如下功能基礎：

（一）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絕不可摧毀固有文化，使中華民族為馬列文化所奴役。

（二）以全民民權為基礎，求取民族和諧；絕不可專政，更不可階級專政，使全民團結遭割裂。「凡人皆民」，絕不可玩弄文字遊戲，諸如「人民民主」之說，或自封為「先鋒隊」等都是愚弄人民，終將玩火自焚。

（三）扶植「適度」私有財產制度，發揮私有財產制之優點，防止量的失調；絕不可集體所有，造成壟斷，造成控制。

（四）教育機會，必須公開公平，有教無類乃可促成社會自然調整；絕不可以政治審查決定入學機會，不僅會遺棄大量智慧，甚且形成新的世襲，造成新階級。

（五）以法律為共守行為準則，人人同受法律保障，人人同受法律約束；絕不可有階級的突出，絕不容專政的特權。

這一制度之可貴，是因為適合中國固有文化的延續性與文明的創新性，可以滿足中國人追求幸福的主觀需求，這一制度可以從根解決中國問題，這一制度以孫中山先生理論為基本依據，且已經過三十餘年實證，能夠為人民提供高度福祉，以這一制度作為統一中國的基礎，十億中國人必可欣然接受。

香港社會制度並非完美，殖民地社會原本鮮有完美。但是香港中國人仍願香港現狀繼續維持，因為與中國大陸共產社會制度相比，香港雖無人民參政權利，却尚保有自由。假若一旦改變為中共所控制，則必將陷入既乏民主，也無自由之處境。香港居民對一九九七年「大限」的悲觀，即由制度比較與取捨而衍生。

如果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已臻合理，則港人不會悲觀，不必消極·拒斥。香港問題最主要啓示，具體地說明人類需要合理社會，中國人需要在合理制度基礎上的統一，中國問題需要在合理社會基礎上解決。

四．中國合理社會取向

宇宙間自然地存在着運行規律，自然生態的和諧與平衡，歷億萬年而依然生氣盎然，顯示出自然規律在相輔相成的互動過程中，發揮出平衡與和諧的宏偉功能。中國文化歷數千年而日新又新，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之間已經融和成爲一體，中國人幾千年來生活在這一文化規律之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中國哲學家老子的名言，那是說凡是過分突出的現象，它所需要的支持因素，必難以持久。當支持「飄風」「驟雨」的因素中止以後，一切重歸平靜，宇宙重返自然規律，歷史繼續在和風細雨中向前，人類思潮再從逆流回歸主流。馬克思的社會構想違背自然規律之太多，中共使中國文化受創太深，正如突來的「飄風」·「驟雨」。

人類自然有其需求，求取生活品質提升，求取生存環境美化，這是人類共同具有的通性，也是中國儒家思想的精華。

「孫中山主義」的建設方向，並無標異之處，既非飄風，也非驟雨，無非是重視人類求幸福的共性，重視文化所應具有的空間殊性。這不是政治口號，而是建國原則，這原則兼具中國文化的延續性，也具迎頭趕上的創新性。

三十餘年海峽對峙，中國人付出極大代價，所獲得的寶貴經驗，證明「孫中山主義」社會制度爲中國人所提供的貢獻，遠優於中國大陸共產社會制度所能爲中國人提供的貢獻。三十餘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突破性成就，已向中國大陸共產制度展示了挑戰性壓力。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感受了這股壓力的沉重與難以抗拒。今天鄧小平不得不提出一些有違馬克思原則的政策，當然與中華民國臺灣基地建設成就的壓力，有着重大關聯。

中國今後歷史性建國任務，那是一般國家所未曾經歷過的重任。過去三十餘年建設經驗，爲孫中山先生的建國理想提供了一個有效果的驗證；也將共產制

度的徒託空言，嚴以責人，很平實地呈現在世人之前。今後的方向已明，長時期海峽兩岸不同型態的驗證，確切地提供了中國人將來取向的共識。「國家利益第一，人民福祉為先」的方針，是中國儒家重要理想，這方針既歸結了過去，解釋了現在，也開啓了將來。以中國文化的基礎，以全民福祉為優先的均富理想，是彌補共產主義在中國的造成的創傷，增益全民幸福唯一可行之道，從長遠處看，中國人正在為中華文化的延續與開啓歷史新契機而奮鬥。